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看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状况和趋势 ——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

钱丽芸^{1,2}, 朱 竑^{1,3}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510275; 2. 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3. 华南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 广州 510631)

摘要:国家级研究基金资助是目前国内学科领域内最高级别的研究支持。自1991年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分别资助文化地理学科16项和47项基金项目,促进了近20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发表成果的增长。论文通过文本分析法,研究国家基金资助下的中国文化地理学科发展区域分布现状、研究特点与质量。研究发现受基金资助的学者产出效率大致呈现上升态势;学科申请依托的学科门类逐渐向社会科学转向,学科间的交叉呈现多元化特征。课题依托单位几乎集中在几个重点院校,呈现圈层放射状分布。研究区域大致覆盖东部,中西部地区研究少,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多次被作为文化研究对象。在学科内部,获得基金资助的作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学科内在关联。研究反映了近20年来中国文化地理研究的学术轨迹和发展趋向,有助于中国文化地理学者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地理学发展趋势及相关基金项目的申请。

关键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文化地理学;知识生产;发展态势

1 引言

现代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1]。相较于英美文化地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绿色”文化地理学的态势^[2-3],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起步较晚近,只是80年代才被逐步介绍到国内^[4]。自90年代起,文化地理学研究话题开始进入政府基金的资助视野。可以认为,国家基金的资助有效地推动了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发展。伴随着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复兴,1990年中山大学司徒尚纪获得第一个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广东文化地理研究,1995年复旦大学周振鹤获得第一个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这标志着文化地理学在国内受到学界关注的开始。从国家科学基金立项项目的角度来考察某一学科的发展状况,在法学^[5]、体育学^[6]、政治学^[7]社会科学领域已有部分学者涉及;在人文地理学内部,女性地理学^[8]、民族地理学^[9]、历史城镇保护^[10]等学科也有过对国家基金资助情形的梳理。文化地理学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学科性质,而相对于其他与经济生活联系密切的经济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人文地理学的分支

学科,整体仍处在较落后的水平。因而,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探讨其基金发展状况显得尤为必要。为了使中国地理学研究不再游离于国外地理学先进思想之外^[11],从文化地理学科发展的角度,考察国家基金对国内文化地理学科发展的推动,当有积极意义。

研究从国家基金资助情况来探究中国国内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概貌,从国家基金研究的数量、质量等方面进行文本分析,刻画文化地理学科的发展状况。本研究的着眼点在于:①基金资助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在地域分布上的特点如何;②文化地理知识的生产者、基金资助的学科对象呈现怎样的趋势;③基金资助的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内容集中在何领域;④基金资助具有哪些中国特性。本文归纳与总结地区内研究开展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趋势,考察地区间的国际基金资助研究的合作情况,以梳理文化地理学研究课题的特点与规律。

2 知识生产视角、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知识生产的研究视角

根据2000年国际经合组织(OECD)给出的定

收稿日期:2010-10; 修订日期:2011-0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71125);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251063101000007)。

作者简介:钱丽芸(1983-),女,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紫砂文化生产与文化地理。E-mail: china01iyun@gmail.com

通讯作者:朱竑(1968-),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E-mail: eeszh@mail.sysu.edu.cn

义,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是指个人、团队或组织成功地生产新知识和实践的境况。文化地理学国家基金的资助,为知识生产提供了资金和政策,以国家科学基金委为知识生产的驱动机构,促使各类研究机构与学者探索文化地理的新课题,推动研究新知识的积累与传播。从知识生产的主体看来,大学、政府和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三重螺旋”^[12]。“三重螺旋”中知识生产的中心是大学,在知识生产中积极参与协作研究网络,而其他部门如政府实验室在知识生产中的强烈地依附于大学^[13]。知识生产的主导者为国家成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基金委导向下,知识生产越来越多地在特定应用的情境中、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按照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解,知识生产的动力是“共同体的承认”,学术人可将“共同体的承认”转变为“社会承认”^[14],学术基金支持和激励学术上取得成功的研究人员^[15]。获得国家基金资助,一般就意味着被学术共同体承认。因此,从国家基金资助的视角关注学科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2.2 本文对象与方法

采用文本分析法,选取1991-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家基金)资助的文化地理学科研项目,对其研究课题及作者等信息分类分析。课题是否为“文化地理学”方向的判断标准为:①基金作者研究方向是否为“文化地理学”;②研究内容是否符合“文化地理学”的研究领域;③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分会的成员;④同行内部评价。本文的科研成果统计,部分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社会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考虑近期官网数据不全,结合了中国期刊网数据库(CNKI)刊载的论文,另外,受资助的各院校、科研机构网站的信息也作为本文数据来源。

3 国家基金立项的文化地理学科

国家基金是中国科学领域最高级别的研究支持基金之一,其确立的研究领域和态势对整个学科

的发展具有一定引领作用。自1991年起,国家基金资助的文化地理学课题共计63项,其中自科基金项目47项,社科基金项目16项。从基金资助类别来看,一般项目、面上申请占69.9%,是主流的科研基金类型。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and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也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占28.6%。其中,青年项目在文化地理学研究项目中比重增加明显,既体现了国家基金对青年骨干学术队伍的关心和提携,也说明文化地理学科中青年学者在创新选题、开拓研究思路方法上的贡献(表1)。

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文化地理学项目申请端口比较复杂和多元。文化地理学研究方向同时包含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内容:自科基金中申请学科涉及到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建筑学、区域生态、区域规划等内容;社科基金中文化地理学对于历史、社会、哲学、文学、宗教等话题均有涉及(表2)。从基金项目的年度分布来看,社科基金项目自2005年以来增加幅度平缓,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增幅比较明显。

3.1 研究主题

国家基金的目的在于宏观调控重点文化现象、引导文化研究转型并且鼓励研究主题多元化。从47项获得资助的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项目看,内容呈现一定“内聚”和传统特点,主题涵盖文化地理研究的5大主题:文化景观(15项)、文化区(14项)、文化生态(9项)、文化扩散和传播(5项)、文化综合作用(4项)(图1)。这些专题化的学术课题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帮助文化地理学科初步构建起研究架构。国家基金作为对研究课题的“指挥棒”,对于有着复杂学科背景的文化地理学体系来说,起到梳理学科脉络结构的功用。从获得基金的传统地理学项目来看,研究问题仍然在Pattison提出的地理学4大传统范围之内,即空间传统、区域研究传统、人地关系传统、地球科学传统^[16]。

中国国家基金资助的文化地理学也经历了与国际文化地理学界呼应的“文化转向”。2001年以来,文化空间、文化认同、性别主义等新文化地理学

表1 1993-2010年国家基金对文化地理研究项目的资助情况统计表

Tab.1 The statistics of research projects of cultural geography funded by the NSFC (1993-2010)

年份	面上项目	一般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地区基金项目	西部项目	自由申请项目	合计	高校资助金额	机构资助金额	合计
科	33		7	7		0	47	43	4	47
社科		11	4		1	0	16	13	3	16
合计	33	11	11	7	1	0	63	56	7	63
比例/%	52.4	17.5	17.5	11.1	1.5	0	100	88.9	11.1	100

注:本表数据包括并列项目,不含子课题。

表2 1993-2010年文化地理研究项目主要研究主题

Tab.2 The research subjects of the projects of cultural geography funded by the NSFC (1993-2010)

项目主题	1993-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总计
中国历史	2		1						1	1		5
社会学								1	1	1		3
民族问题研究						1	2				1	4
哲学			1									1
宗教学										1		1
语言学										1		1
新闻学											1	1
社科合计	2	0	2	0	0	1	2	1	2	4	2	16
D0101自然地理学												1
地貌学D0101									1			
D0102人文地理学												37
D0102	2								2			4
D010201	2	1	3	1				2			1	10
D010202 社会、文化地理学	6		1			1	1		4	4	1	18
D010203 城市地理学		1		1		2		1				5
D0103 应用气候学											1	1
其他												8
D011 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		1										1
D0112 区域可持续发展					1							1
E0801 建筑学				1								1
E0802 城乡规划	1							1	1	1	1	5
自科合计	11	3	4	3	1	3	1	4	8	5	4	47

注: 2007年开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学科分类名称作了改动, 本文采用2007年后分类法。

范畴的基金课题累计达17项, 占总课题63项的约1/4。分析新文化地理学基金项目可以发现: ①城市与社会的文化空间主题成为目前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 占有基金项目的6%, 学者们以北京、南京、深圳及广州的城市文化、空间演替等作为研究对象给予关注。②女性地理学视角正在成为文化地理研究者们重视的焦点, 包括城市女性、乡村妇女的独特现象、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角色与社会文化影响等女性主义话题占6%。③基金选题及研究内容正呈现多元化点, 文化身份与认同地理、城市移民与地方感、文化全球化与文化重构等与国际研究接轨的话题正逐渐进入国家基金资助行列。纵观国家基金项目选题, 早期的文化地理研究的选题基本是面向区域发展、区域理论, 更多关注区域及区域文化特征的研究, 缺少对区域文化影响下区域经济、社会等行为结果的综合研究^[7]。随着文化转向在国内学术界的兴起, 学者们开始关注起文化景观的社会和权力关系层面, 关注文化地理学现象背后的空间、认同等差异, 使新文化地理学在不到10年时间内快速成长。

3.2 知识产生地——研究学院派系

一旦确立基金项目, 国家基金委与高校即达成

①注: 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概括: “科学共同体”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 他们自认为也被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 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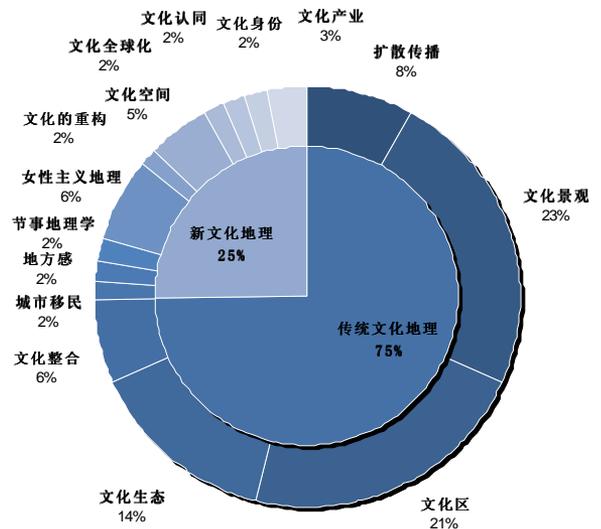


图1 文化地理学国家基金项目内容分类图

Fig.1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of cultural geography projects funded by the NSFC

了合作生产知识的协议。主持基金的学者以大学、科研机构为主“知识生产单位”^[8], 他们构成的“学术共同体”^①成为国内文化地理学滋生的土壤, 而此土壤的构成并非单一。文化地理学科的多元化, 导致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具有很强的差异性, 国家基金

承担者的知识生产团队异质性很强。从获得国家基金院系来看,既有历史地理学、民族社会、宗教学等人文学科,亦有城市地理学、景观学、建筑学等理工学科。与人文地理其他分支相比,文化地理研究与历史的关系特别紧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地理学理念进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尤其以历史文化的空间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有“历史文化地理”的称法^[9]。统计这部分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获得国家基金的周振鹤、司徒尚纪、靳润成、刘沛林、张伟然、张晓虹等学者均具有历史地理背景,基金课题关注特定文化的专门史、文化现象的部门地理研究。另外,其师门传承呈现“内生性”(Endogenous Knowledge Production)的特点,高校中同一门派、导师和学术团体的研究课题具有内联特点。复旦大学周振鹤主持最早的文化地理学社科基金——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张伟然、张晓虹负责了该项目的部分章节撰写。张晓虹用历史地理学方法考察西北地区的信仰、风俗,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一项;张伟然于1996年开始两度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即是文化地理学“内生性”的表现。

3.3 学院、研究所对基金项目的支持

3.3.1 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作用

文化地理学的内生性既有利于学科知识的传承,培养的人才又带动学科发展。以全国3个人文地理学重点学科^②之一的中山大学为例。中山大学文化地理学培养人才发挥了重点学科人才培养的优势作用。国内最早的文化地理学自然科学基金为中山大学司徒尚纪1991年开始主持广东文化地理研究。自1996年培养博士生以来,司徒尚纪培养的博士生朱竑主持海南岛文化地理研究、广州城市文化地理研究;李宁利在岭南开展华南乡村妇女的女性地理学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王彬、薛熙明毕业后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从事闽台研究、宗教地理研究。知识生产具有延续性的特点,往往可以通过师徒关系,传给年轻的文化地理学者。而由国家基金项目培养出的博士,毕业后在科研的道路上也获得国家基金资助,实现传承“知识的延续性”之目的。

3.3.2 对院校科研氛围的强烈带动

在国家基金资助下,知识产品具有可共享、可增殖^[20]特性突显出来,所在院校的科研氛围激励效

应被放大,对以后申报社科类基金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北京大学唐晓峰于2002年和2007年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周尚意有2项文化地理学基金,成为带动北方院校文化地理学科研氛围研究的示范点。中山大学先后共取得8项国家课题,极大推动文化地理学科增长。国家基金对区域文化研究的鼓励,更使得中西部地区的青年研究者敢于依托当地地域文化,开展本土文化的课题研究。西南林业大学唐雪琼申报的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转型与女权文化演进: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妇女地位和社会角色变迁影响研究”,成为该校人文社科类基金项目零的突破。

4 文化地理学主持国家基金单位的空间分析

4.1 国家基金研究学者特征

4.1.1 基本特征

(1) 按基金主持人性别构成来看,63项文化地理学基金项目有18项主持人为女性,占到了项目总数的28.5%。自然科学基金的6项地区项目中有4项由女研究者主持,仅有的1项西部项目的主持人为女性。新文化地理学范畴的16项基金课题中10项为女性主持,可见女性研究者在文化地理学研究队伍中占比正在急速上升。

(2) 获得国家基金的文化地理学研究者队伍正在趋向年轻化。63个项目主持人中,平均获得国家基金的年龄为42岁(社科42.4岁,自科42.7岁)。2000年以前,获得的文化地理的自然科学基金中有64%的项目主持人年龄小于50岁,随着研究队伍年轻化,2006年以后几乎90%的项目主持人年龄小于50岁,而社科基金主持人在50岁以下的比例,也从2000年前的50%提高到82%,年轻化的比例在明显上升。在获得立项当年,基金主持人49%具有高级职称(教授29人、研究员1人),38%具中级职称(副教授15人,副研究员9人),获基金当年为讲师职称的占13%。主管部门在资助“知识生产”的时候,正给年轻的文化地理学者提供科研的舞台。

(3) 年轻研究者与资深研究者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且自然科学基金更依赖于30~50岁之间的主力科研人群。文化地理学自然科学基金主持人72%属于这一年龄段,超过社科主持人63%的比例。这说明自科

^②根据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名单。

项目学者产出的黄金年龄比较集中。而社科基金小于30岁和大于50岁的获得者均相对较多,可以推测社科基金的研究周期相对长,年轻学者容易获得资助,同时资深教授也更偏好于做总结性的社科基金。角媛梅、王彬、李蕾蕾等年轻学者不断涌现,而南京大学黄春晓、张敏更是在30岁之前即获得国家基金的垂青。年轻学者的学术发展历程多为先申请到“青年项目”,然后申请“面上项目”。在年轻化的总趋势下,文化地理学者年龄两极分化,印证了吉本斯(Gibbons)所说的知识生产者的“异质性”特征^[21]。

4.1.2 基金研究者空间特征与结构

1993-2010年承担文化地理学研究项目的单位显著集中于高等院校,全国29所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承担了57项研究项目,占项目总数的90.5%;4所科研院所承担研究项目6项,只占项目9.5%。中山大学8项,复旦大学7项,南京大学、西南林业大学各3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大学、景德镇陶瓷学院、衡阳师范学院各2项,其余18所大学各1项。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3项文化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地理研究所各1项课题。文化地理学基金项目分布总体呈现吉本斯(Gibbons)所谓所谓知识生产场所“社会弥散”(Socially Distributed Knowledge)^[21],成为当代科学生产之风景线。

图2用GIS展现出文化地理类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院校、项目研究案例地。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主力集中在广州、上海、北京、南京、昆明5个城市。广州文化地理学者获得国家基金11项,其中自科基金9项;上海学者共承担基金9项,其中自科6个课题;北京市与南京市承担的文化地理基金课题均为8个,并列排第三;而云南昆明市高校在文化地理学科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异军突起,近年来承担7项课题,西南地区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为其提供了丰厚的研究土壤。综合观之,基金研究者空间分布大致在黄河流域、东南沿海,延伸至西南内陆呈现“横U型”。以地理标志线胡焕庸线(瑗瑛—腾冲线)以西的内陆地区,兰州市是唯一获得文化地理学国家基金的城市,与广州、北京、南京3地共同成为中国当代地理学4大中心^[22]。而长江中上游流域、东北地区的高校的文化地理学科发展尚不显著。

4.2 国家基金研究内容特征

本文分析的61项基金课题,对课题研究案例地点作统计,以GIS统计映射其空间分布。

(1) 被研究次数最频繁的区域。累计研究基金数大于5项,有广东省、南京市、云南的大理、丽江和红河地区。此类区域的研究几乎都立足高校所在地区,开展本土研究,即研究与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23]:广东省承担的基金项目研究区域以岭南、广东为主;南京的学者也以所在城市为蓝本,对城市文化展开探索;云南省开展的研究则在少数民族各个州市展开,与文化多样性密切相关。基金资助主体——国家基金委在学科知识生产中的主导策略,鼓励了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课题中青年项目、地区项目的增长(图3)。

(2) 被研究次数在3~4项基金之间的区域。除了开展本土研究的西南、岭南地区外,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展开跨区域的文化研究。此类研究区域面积相对较广泛,分布在广大的西北地区、北京、上海、岭南和西南地区,空间上呈现“横J型”。西部地区文化多样性丰富,学者集中研究了西北地区民族、风俗、信仰、历史文化等;运用历史地理的传统方法对汾沱河、泗水流域的考古文化进行研究。新文化地理学则立足本地,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周尚意对北京的社会和城市文化空间进行结构主义的研究,西南林学院唐雪琼对云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影响、社会角色变迁的研究,云南师范大学陈亚颢从旅游发展对民族文化的重构的研究。

(3) 有1~2项文化地理基金研究的区域。分布在东北地区、华北淮河流域、闽台地区和川藏内陆,区域内高校获得国家基金资助不多。部分研究项目如下:东北地区对佛教影响下地域文化的研究、黄淮流域在历史变迁中的文化互动,江苏南部乡村文化景观、江苏东北部语言地理研究、闽台区域文化演化与文化认同、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景观研究。这些研究充分扩展了文化地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研究普及性。总体看来,中部地区研究相对较少,而西北、西南地区开展的文化研究广泛。研究重复开展最多的是省为广东、江苏和云南等省份,而广大西部省份地域文化多样性丰富,容易出现著名的研究。例如大多数地理思想的传统学派发源地古希腊,就有很多的文化多样性^[24]。而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学大国,要变成一个地理学强国,应当在积极参与野外工作的基础之上,从现实中寻找理论灵感和问题,用数据来提出自己的假说和理论^[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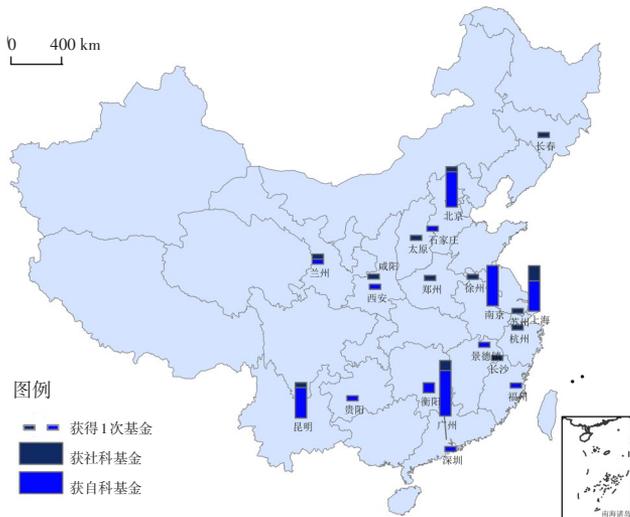


图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文化地理学研究机构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conduct the cultural geography projects funded by the NSFC

4.3 国家基金研究网络分布

本文截取最近7年(2004-2010年)结题的共计19项文化地理学基金为小样本,把国家基金结题成果所列举的合作者视为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26],考察基金成果作者们的合著行为关系蕴含的结构。可统计的资助期刊发表总数为212篇,平均每个基金发文11篇,最多的基金项目发文38篇;成果中涉及的作者共有199人,平均每个基金由10人参与,最多的基金参与者为31人。科学基金形成了“社会化的网络”,使得学科基金知识生产者与其他个体的知识生产形成互补、互助的知识交换。科学基金鼓励研究者的个人兴趣,实现自我资源的供给,使得知生产活动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和动力。

中国文化地理学基金资助的合作网络正在开始走向国际化,但学术国际化水平还很低。国家基金支持的项目成果显示,周尚意、唐晓峰、刘沛林等目前与国外单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27]、美国锡拉丘兹大学^[28]、加拿大滑铁卢大学^[29]、英国卡迪夫大学^[30]有合作,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研究生与内地尤其珠三角学者合作^[31],保留了文化生产传统。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邀请段义孚至地理与遥感学院演讲^[27],翻译稿作为周尚意主持的国家基金项目成果,有助于国内学科了解国外文化地理学动态。但有国际合作的科研成果比例不超过212篇文章的3%。用社会网络图关注基金作者的合作性,能从一个侧面展现文化地理学基金参与者之间彼此的关系。按照地理学具有的制图学和行为地理学2大传统^[24],本文把近7年结题的基金支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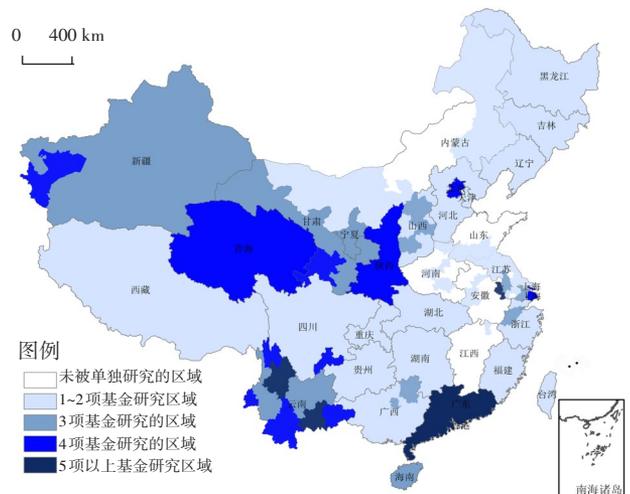


图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文化地理学研究案例地分布图

Fig.3 Distribution of the areas for case studies of cultural geography projects funded by the NSFC

共计212篇科研成果作统计,得出基金合作者的国内社会合作网络图(图4),可见:文献作者地域分布总的特征是南北差异比较大,除了北京、陕西和河南外,作者分布在长江以南的省份。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有助于推动文化地理学“书斋式”的研究向“实践型”转化。考察2004年以后高校承担基金的科研成果,可以发现部分成果是高校与各省市的城市建设、土地规划、交通管委、地质调查、城市规划等部门与研究院合作的产物。基金支持的科研队伍,培养了一批研究生、本科生的科研水平。北京师范大学推行人文地理学本科教学创新体系^[32],中山大学资助基金中硕博研究生参与的比例约为70%^③。刘沛林用基金出版专著,带动多位学生参与科研论文写作^[33-34]。基金推动了研究者带动一批学科的发展,成果各个环节分别为一批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国家级研究课题集中于重大现实问题和学科前沿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整体水平,确立的研究方向对整个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这些基金的资助促进了20年来文化地理学论文量的增长。

(1) 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主力集中在广州、

③19项基金的小样本里中大主持4项,基金资助发表文献、书籍共79篇,其中55篇有硕博学生参与。

采用更细致的性别、亚文化、种族、移民等视角。中国文化地理学未来的研究,除了要关注现代社会转型、全球化语境条件下的文化现象之外^[43],更多前瞻性、探索性、基础性的项目需要被青年基金、面上项目甚至重点项目支持^[44]。用“研究生产力”来体现研究者的“价值”^[45],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的作用顺应现阶段知识生产方式变迁,将对未来国家基金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未来在在多元的、冲突的和与权力有关的^[46]的知识生产中,中国西部地区的文化地理学、多民族的文化地理学话题、本土研究、多样化的文化现象等还需加强,需要国内同行积极应对全球文化地理学研究风起云涌的势头,开展富有成效和多样化的跨学科学术交流。

参考文献

- [1] 朱竑, 司徒尚纪. 近年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 地理科学, 1999, 19(4): 338-343.
- [2] Doughty R. Environmental theology: Trends and prospects in Christian thought.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1, 5: 234-248.
- [3] Evernden N. The Social Creation of Nature.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57-72.
- [4] 朱竑, 林婕, 魏雷. 从百期《人文地理》看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脉络. 人文地理, 2009, 24(5): 13-20.
- [5] 常安. 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看法学研究状况: 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现代法学, 2006, 28(2): 174-185.
- [6] 田雨普, 张文静.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体育科学, 2006, 26(4): 9-13.
- [7] 李振. 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看中国政治学科发展状况: 基于1993-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政治学类立项项目的分析.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10(1): 59-66.
- [8] 唐雪琼, 朱竑, 王浩. 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情况看中国女性研究的发展态势. 妇女研究论丛, 2008(5): 76-82.
- [9] 杜芳娟, 朱竑. 中国民族文化研究态势与审思: 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角度. 人文地理, 2010, 25(4): 72-76.
- [10] 陶伟, 徐辰. 中国历史城镇保护研究的三维体系: 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分析. 建筑学报, 2009(9): 60-63.
- [11] 蔡运龙, 陆大道, 周一星, 等. 地理科学的中国进展与国际趋势. 地理学报, 2004, 59(6): 803-810.
- [12] Shinn T. The triple helix and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Prepackaged think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2, 32: 599-614.
- [13] Godin B, Gingras Y. The place of universities in the syste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Research Policy, 2000, 29(2): 273-278.
- [14] 皮埃尔·布尔迪厄. 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 陈圣生, 涂释文,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15] Vysoka A. The role of the public university in an innovation-based society: A Delphi forecast for the Czech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4.
- [16] Pattison W D. The four traditions of geography. Journal of Geography, 1990, 89(5): 202-206.
- [17] 宋长青, 冷疏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的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 地理学报, 2004, 59(增刊): 8-10.
- [18] Arocena R, Sutz J. Chang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Lat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Research Policy, 2001, 30(8): 1221-1234.
- [19] 张伟然.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 江汉论坛, 2005, 1(1): 99-100.
- [20] Ziman J M. Prometheus Bound: Science in a Dynamic Steady Stat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1] Gibbons M.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Stockholm: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4.
- [22] 司徒尚纪, 许桂灵. 中山大学地理学的学术创新、学术风格和社会贡献.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49(3): 66-77.
- [23] Crang M. Cultural Geography. Oxon: Routledge, 1998.
- [24] James P E, Martin G J. All Possible Worlds: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2nd ed. New York: Wiley, 1981: 408-424.
- [25] 汤茂林. 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多样化问题. 地理研究, 2009, 28(4): 865-882.
- [26] 刘军. 整体网分析讲义.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4.
- [27] 段义孚.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 左一鸥, 等译. 地理科学进展, 2006, 25(2): 1-6.
- [28] 张雷. 葛德石与中国近代地理学.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164-1174.
- [29] 刘沛林, Liu Abby, Wall Geoff. 生态博物馆理念及其在少数民族社区景观保护中的作用: 以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5, 14(2): 254-257.
- [30] 袁媛, 吴缚龙, 许学强.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地理学报, 2009, 64(6): 753-763.
- [31] 刘超群, 李志刚, 徐江. 新时期珠三角“城市区域”重构的空间分析: 以跨行政边界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国际城市规划, 2010, 25(2): 31-38.
- [32] 周尚意, 朱华晟. 人文地理学本科教学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中国大学教学, 2008(11): 55-59.
- [33] 刘沛林. 中国古村落之旅.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7.
- [34] 刘沛林. 古镇名村: 景观特点与价值体现.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 [35] 范省伟. 试论知识生产的特点及其内在运行规律. 生产力研究, 2004(8): 19-20.
- [36] Delgado M. Knowledge creation processes: Theory and

-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knowledge-intensive firms. *R&D Management*, 2008, 38(3): 354-354.
- [37] Cassidy M, Görg H, Strobl E.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plantlevel data for Ireland.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52(3): 344-358.
- [38] Oztemel E, Tekez E K. Integrating manufacturing systems through knowledge exchange protocols within an agent-based knowledge network. *Robotics and 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2009, 25(1): 235-245.
- [39] Yeh E. Tropes of indolenc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in Lhasa, Tibe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7, 97(3): 593-612.
- [40] Oakes T.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invention of local culture in China: The case of Tunbao heritag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003.
- [41] Oakes T, Afton Sather.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Identity Building in Northwestern Chin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009.
- [42] Zhang Li. Contested spatial modernity in late-socialist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2006, 47(3): 461-484.
- [43] 李凡, 司徒尚纪. 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文献分析. *人文地理*, 2007, 22(1): 105-111.
- [44] 冷疏影, 宋长青.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中国西部地表过程研究重要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11): 1283-1292.
- [45] Schultz J J, Meade J A, Khurana I. The changing roles of teaching, research, and service in the promotion and tenure decisions for accounting faculty. *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1989, 4(1): 109-119.
- [46] Gibson-Graham J K. *Poststructural interventions//Shepherd E, Barnes T. A Companion to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2000: 95-110.

Progress in 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Reflected by the Project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QIAN Liyun^{1,2}, ZHU Hong^{1,3}

(1.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enter for Tourism and Research, Sun Ye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3. Center for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Since 1991, a total of 63 foundation projects of cultural geography have been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one of the highest levels of research support in China, including 47 projects in Natural Science and 16 projects in Social Science,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geography, and advancing the growth of cultural geography literatures in the past 20 year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fund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urrent regional distributions of 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in China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NSFC by examining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ion of NSFC by text analysis. A knowledge production function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actual performance of project items by explaining the inputs and outputs of the subjects. Our research finds the optimistic trend that scholars supported by the fund generally make output efficiently. Most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cultural geography are located in the coastal cities, in a few research centers which have delivered key researchers. Much of cultural study area covered in the east, especiall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s, whil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re less studied. The projects are becoming interdisciplinary, in both social sciences and applied subjects. This result of this paper reflects the academic track of Chinese cultural geography in the past 16 year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fund applications and for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cultural geography.

Key words: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cultural geography; knowledge production; development trends

本文引用格式:

钱丽芸, 朱竝.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看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状况和趋势: 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10): 1289-1297.